（上接第 13 版）

中國的戰略轉變（改革開放），并致力于將中國融入國際體系，使其成為體系中的一個完全的成員。（現在）巨龍已經崛起并融入世界。從聯合國到世界貿易組織，從關于臭氧層消耗物質的協議到關于核武器的協定中國都是談判桌上的玩家”。顯然，美國官方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內外一強弱”格局已經終結，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主要大國并完成了融入國際體系的任務。

第二，認同中國是國際體系內的積極力量，但開始對中國如何運用新近獲得的權力表現出一定疑慮。美國認為中國總體上仍然是一個“維持現狀國家”。哈斯稱，“市場活力取代了教條，中國出口計算機而非意識形態”。佐立克也明確表示，“中國不是蘇聯。中國不尋求傳播反美極端意識形態，不認為要與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最重要的是，中國不認為其未來在于推翻國際體系的基本秩序。相反，中國領導人認為要取得未來的成功，需要與現代世界緊密連接”。與此同時，以哈斯和佐立克為代表的美國戰略界對“崛起并已進入國際體系中的中國”如何使用新獲得的權力表達了疑慮。哈斯期待中國能夠用崛起的權力支撐核不擴散等國際體系，同時要求中國降低關稅、減少投資壁壘、推進法治、促進人權。佐立克在其演講中提出，問題的關鍵在于，（中國崛起和融入之後）將如何使用自己的影響力。佐立克表達了對中國“經濟重商主義”、知識產權、軍事現代化、與所謂“流氓國家”的關系等問題上的疑慮。這些問題在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內是中美關系中的主要問題。

第三，對其國內制度變化的期待逐漸降低。2002 年布什政府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仍然用了頗長的篇幅強調中國國內政治問題。報告宣稱，中國“民主發展對未來至關重要”，“中國對其未來的國家特性還需做出一系列重要選擇”。報告仍然相信，到未來的某個時候中國會選擇西方式的“政治與社會自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會“推進中國的透明度與法治”。到 2006 年布什政府發布第二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時有關期待國內政治變化的表述大幅減少。在這份報告中，布什政府對中國的疑慮已經轉向中國能否堅持和平發展，能否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出現這種變化，當然并不是因為美國對中國戰略走向感到滿意而是因為美國開始感受到中國崛起在外交和軍事層面帶來的衝擊，已顧不上對其內政過多地指手畫腳了。

第四，更多地從大國博弈這一現實主義邏輯視角看待中美關系。與克林頓政府強調全球化的特徵明顯不同，布什政府更多的是從大國關系這一層次看待中美關系，其競選和上任初期強調的“戰略競爭者”是一種大國對抗邏輯；而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布什政府開始強調“大國合作應對非傳統和新型挑戰”。中國以及其他大國成為可以與美國合作的世界政治中的理性力量。2002 年哈斯在演講中指出，“我們可以從防御性的大國力量平衡走向大國的力量匯聚 以迎接新世紀的挑戰，抓住新世紀的機遇”。這一邏輯在 2002 年布什政府公布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也有着清楚的表述。報告稱：“自從 17 世紀民族國家崛起以來 我們現在面臨最好的機會，去建立一個大國在其中和平競賽而非準備戰爭的世界。為應對恐怖暴力與混亂，世界大國都團結一致地站在同一邊。”

第五，認為美國需要超越“接觸”戰略。既然中國已完成融入國際體系的任務，“接觸”戰略與新形勢的相關性就顯得不足了。無論哈斯還是佐立克都認為美國的“接觸”戰略是成功的但在“總體成功”的判斷之下，兩人都提出了美國對華戰略的下一步該怎麼走的問題。哈斯直言，“為‘接觸’而接觸是不夠的”。佐立克認為，美國的對華戰略需要“超越向中國打開大門、歡迎其成為國際體系一員”的階段，而應當轉而“促使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實際上，在美國政府之外，學界、媒體開始對“接觸”及其背後的戰略邏輯做出更為嚴厲的批判。孟捷慕（James Mann）在其《中國幻想曲》一書中直接批判了“接觸”戰略的戰略前提，即通過與中國接觸，中國的政治體制與外交取向會向着美國所樂見的方向發展。這一判斷在當時的美國戰略界顯得相當另類和極端。但十年後的今天再回看這一判斷，似已被美國戰略界主流接受。

作為“超越接觸”的方案，佐立克在其演講中提到一個關鍵的對華戰略術語：“兩面下注（hedging）”。“對中國將如何使用新獲得的權力的不確定，將導致美國和其他國家在對華關系上采取‘兩面下注’的做法。”在布什政府的第二任期內，“兩面下注”逐漸成為一個被美國政府與戰略界廣泛使用的概念。布什政府 2006 年公布的第二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兩面下注”作為美國與其他大國打交道時的五大原則之一。報告宣稱，美國“尋求鼓勵中國做出正確的戰略選擇，同時也為其他可能性而兩面下注”。這意味着“兩面下注”成為美國官方的對華戰略表述。美國學者麥艾文（Evan S. Medeiros）對“兩面下注”的解釋是：“一方面繼續強調接觸與融合機制，另一方面則通過與其他亞洲國家開展安全合作、加強本國軍事力量現代化等方式，對對方進行現實主義風格的制衡。”“兩面下注”被越來越廣泛地使用，代表着布什政府對華戰略在傳統的“接觸”戰略基礎上開始強調新的要素，即“防範”。“兩面下注”的戰略邏輯實際上是“接觸 + 防範”。在布什政府任內美國一方面繼續加強與中國的合作，中美關系的廣度與深度都在強化；另一方面，強化與日本等盟友的關系，大力提升美印關系等。這些都是其對華“兩面下注”的典型政策。“兩面下注”不同于遏制或制衡，整體上仍保持着對華積極交往的勢頭，也仍然期望通過接觸塑造中國的走向。較 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美國對華戰略的消極面在上升，但這種消極面主要還是針對“遠憂”、針對一種“可能性”所做的防範措施。

三、奧巴馬政府的“接觸 + 規制”

奧巴馬政府 2009 年上臺執政時，美國正處于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當中，而中國由于應對措施有力，在全球危機背景下維持超高速增長，中美“體系內兩強”定位到奧巴馬政府執政初期已比較清晰。曾任奧巴馬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的杰弗裏・貝德（Jeffery A. Bader）在論述奧巴馬政府外交戰略的前提時，首先提出的就是“亞太地區在美國外交政策中應獲得更優先的地位……在亞太地區甚至在全世界，最近戰略性的變化就是中國的興起”。顯然，奧巴馬政府清醒地認識到了國際格局的重大變化，因此對中美關系高度重視。其執政第一年也順利實現了對華政策的平穩過渡，并未出現歷史上不同政黨的美國總統上臺後總要經歷“學習曲綫”的問題。然而好景不長，在多種因素共同作用下，從 2009 年年底開始，中美關系開始進入下行周期。在其後的七年裏，盡管中美關系未出現重大突發危機，但是卻出現了幾輪較明顯的波動：第一輪大致從 2009 年年底哥本哈根氣候峰會開始到 2011 年春季中國領導人訪美參加核安全峰會為止；第二輪從 2013 年 11 月美國反制中國宣布東海防空識別區開始，到 2014 年春季兩國開始籌備當年戰略與經濟對話為止；第三輪則大致從 2015 年年初開始，到當年 9 月中國領導人訪美為止。這幾次波動出現的頻率之高、對戰略互信的影響之深，為冷戰結束以來所僅見。

在起伏不定的現象之下，奧巴馬政府對華戰略出現了如下特點。

第一，盡管 2010 年之後中美關系出現了不少困難 但總體看，奧巴馬任內中美關系仍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次數與深度遠超過往，兩國政府間以戰略與經濟對話、人文交流高層磋商為代表的對話機制深入發展，兩國經貿人文交流日益深入，兩軍交流突破了過去缺乏持續性的困境建立了初步的危機管控機制和相互信任措施。在奧巴馬政府第二個任期內，中美兩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共同引領了這一進程，促成巴黎氣候峰會成功舉辦。此外，兩國在朝核、伊朗核問題上有效合作，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全球治理機制改革方面，美國支持了中國獲取更大國際空間的努力。總之，奧巴馬政府任內，中美兩國合作範圍之廣、對世界的影響程度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對華戰略中消極面明顯上升。在中美關系合作面大幅擴展的同時，奧巴馬政府對華戰略中的消極面也明顯增大，在整體關系中的比例有明顯上升。如 2010 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還是一般性地關注了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和如何運用外交力量，與小布什政府時期差別不大；而在 2015 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美國不僅在安全領域的關切大幅上升，在“持續監督中國軍事現代化”之外，又加上了對可能“使用武力恐嚇來解決領土爭議”的警惕，宣稱要“基于力量來管理分歧，堅持讓中國在從海上安全到人權的各種問題上遵守國際制度、尊重國際規範”。從具體政策層面看，奧巴馬執政期間，中美經濟、外交、軍事摩擦都時常出現。在一些重點問題領域，奧巴馬政府對華實行了強硬的“選擇性推回”做法。如 2013 年 11 月中國宣布東海防空識別區後，美軍帶頭派遣軍機挑戰；美國司法部 2014 年 5 月以所謂“網絡竊密”為由，發出起訴；2015 年 9 月中國領導人訪美前夕，美國媒體放風稱要就所謂“網絡竊密”問題進行制裁；中國在南海開始島礁吹填工程後，美國海軍增加了所謂“自由航行行動”的頻率與行動的挑釁性，并不斷通過媒體大肆渲染，不斷拉抬兩國之間的緊張氣氛。

第三，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戰略無論是積極面還是消極面都顯示出較強的自由主義色彩。美國任何一屆政府的對外戰略當然都兼具現實主義成分和自由主義成分。奧巴馬政府也有其現實主義成分，如強化在亞太的軍力部署等。但與布什政府相比，奧巴馬政府戰略選擇中的自由主義色彩更為突出。一是從地區視角處理中美關系。奧巴馬政府幾乎沒有提出單獨的對華戰略論述，而是將對華戰略置于以“再平衡”為代表的亞太地區戰略之內。時任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Hillary Clinton）2011 年 10 月非常清楚地指出，“我們將繼續把我們與中國的關系嵌入到由安全盟友、經濟網絡和社會聯結所組成的更寬廣的地區框架之中”。美國更多地使用“盟友牌”“伙伴牌”，不僅強化了日美同盟，推動其亞太盟友體系走向網絡化，而且與越南、緬甸等國家關系都有重大突破；力推排斥中國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且多次從中美國際經濟領導力競爭的視角解讀這一協定，宣稱不能讓中國制定游戲規則。二是強調國際制度更加重視動員多邊力量來限制中國的行為。美國 2010 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宣稱，美國將持續接觸中國，“這種接觸將加強基于權利與責任的國際秩序。交通規則必須被遵守。這些國家如果打破規則，將會產生代價”。奧巴馬政府更多地使用“規則牌”，支持菲律賓到國際仲裁庭提起所謂“南海仲裁案”，向中國施壓；美國雖未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卻以捍衛“航行自由”為借口大肆炒作南海問題；在網絡安全問題上 反復要求遵守網絡空間的“交通規則”。三是高度重視全球議程合作。奧巴馬政府期間，中美兩國在合力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帶頭應對氣候變化等方面的合作是兩國關系中“正能量”的主要來源。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在奧巴馬第二任期的後期，中美關系出現了走向新的戰略均衡的苗頭。這表現在兩國關系雖然持續緊張、多次下行，但是始終沒有破局，也未墜入美俄關系那樣的“新冷戰”狀態。每次困難局面持續一段時間，雙邊關系就會回擺。南海、網絡等重大議題雖未徹底解決，但是又都先後趨于穩定或者降溫。這似乎表明，兩國關系在面臨新“上限”的同時，也逐漸形成新“下限”。之所以能夠出現新的戰略均衡苗頭，從“技術層面”看，一是因為兩國領導人在中美關系出現困難時都表現出願意妥協、希望將中美關系拉回正軌的強烈意願，二是兩國領導人以及政府部門之間建立了頗為穩定而高頻率的高層交往機制。但是從更根本的結構性原因來看，當中美都逐漸適應、接受“體系內兩強”的定位之後，形成新的均衡與穩定或許衹是時間問題。

在奧巴馬政府一方面堅持“接觸”、另一方面利用國際制度強化對中國的“管控”與“引導”（亦即“規制”）的同時，美國戰略界對華判斷在奧巴馬兩個任期內明顯負面化。奧巴馬政府期間，美國戰略界至少有兩次比較大的對華戰略討論或辯論。第一次討論大致從 2008 年到 2010 年前後，美國戰略界興起所謂“中國強硬論”的討論。美國國內越來越多的人批評中國在處理美國對臺售武、美國總統接見 DL 等問題上態度極為強硬。這場辯論也涉及中國的國內政治與經濟政策走向。一些美國學者攻擊其在經濟政策上偏向本土企業，對外開放“停滯”等。更多的美國學者開始呼應孟捷慕 2007 年提出的觀點。“與那些主張更緊密地接觸中國的西方人所期待的不同，中國不會變得更加自由化。”第二次討論發生在大選前的 2015 年。這次討論參與的人數之多、對美國近幾十年對華戰略的質疑程度之深，都是多年未見的。甚至有美國學者認為，這場辯論的激烈程度“肯定是 1989 年以來所僅見，可能也是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美國開始嚴肅討論中美關系正常化以來所僅見。辯論的某些部分甚至讓人想起（二戰後）‘誰丢失了中國’的大辯論”。與上一場辯論主要聚焦于中國外交是否“變得強硬”不同，這場辯論在更大、更深的程度上以中國國內的發展為背景。十八大後，中國加強意識形態工作、制定《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等立法議程成為美國戰略界辯論的主要議題。對中國外交的辯論則認為其已經告別“韜光養晦”階段，圍繞中美網絡安全爭議、南海問題、中國是否要在現行國際體系之外構建平行體系等問題展開。一些聲音

（下轉第 15 版）